

第三章

东柏林会议

本章提要 欧洲二十九个共产党会议经过长期酝酿、讨论与争吵，终于在1976年6月在东柏林召开了。克里姆林宫作了某些让步：同意从共同宣言中删去对中国和毛主义的谴责，并放弃了苏共领导作用的提法。

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占上风。会议反映了斯大林主义面临着总的危机：苏联对执政的共产党逐渐失去控制；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逐渐失去控制；执政的共产党对群众逐渐失去控制；苏联官僚集团对苏联社会逐渐失去控制，以及西欧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危机。

曼德尔认为，苏联官僚集团现在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它担心欧共与资产阶级一体化会走得太远，担心欧共反官僚集团的情绪会影响到莫斯科对东欧以及对苏联自己党内和群众失去控制。但是，它又不敢对欧共采取革出教门的做法（象当年对待南斯拉夫和中国一样），担心这样做会产生更大的离心作用。

不应当对欧洲共产主义和多中心论在东柏林会议上取得的成果作出片面的估价。贝林格等人在东柏林会议上用民主的“宣言”换取了极高的威信，使他们能够操纵并从而能够背叛西方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完全放弃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这是他们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采取完全依附态度的必然结果。西欧共产党领导人思想上的退却，对广大党员起了消极作用，削弱了他们的革命斗志。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过去对苏联官僚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只是小心翼翼地提出抗议，如今西班牙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居然提出托洛茨基是伟大的革命者，这在曼德尔看来是一种进步。

最后，曼德尔号召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向着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工人委员会的民主权利，建立欧洲和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前进。

——译者

1977年6月^[1]，欧洲二十九个共产党会议终于在东柏林召开了。某些国家共产党的报刊，首先是《真理报》，欢呼这次集会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曾把他个人的声誉全部押在这次会议上。事实上，在共同宣言的一些关键性的段落上，一些共产党的领导——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南斯拉夫、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罗马尼亚——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分歧非常之大，以致在很长时间内这次会议好象完全没有召开的可能。

即使是这次会议终于开成了，这也主要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在他的对手所坚持的所有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克里姆林宫的最大让步，大概要算从共同宣言中删去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毛主义的谴责，以及放弃“苏共领导作用”的提法。即使有了这些让步，也不能阻止那些最坚决的鼓吹多中心论的人——首先是意大利的贝林格和西班牙的卡里略，但也包括铁托——公然宣布这种会议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将来决不应再起草共同文件，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党自己来解决。

一些错误的解释和一个正确的解释

在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这次会议应占居什么位置呢？在对它的各种解释中，有许多是不值一驳的。有一种解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基辛格——范范尼之流）以及某些所谓极左派教条主义分子都持这种观点——轻率的声称，这次会议只不过是在玩弄一种文字游戏，旨在欺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他们还声称，实际上勃列日涅夫、贝林格、铁托和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

假如情况果真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些几乎使这次会议难产的冗长的讨论，以及无数次冲突和争吵，更不用说理解下面这些事件了：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比拉克们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的尖酸刻薄的辱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公开抨击；莫斯科拼凑一个以利斯特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来反对卡里略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的企图；以及苏共致所有“兄弟”党的那封信，其中谴责说，“对资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的捏造，我们的（法国）共产党同志们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

第二种论点与第一种截然不同，但是同样荒谬。这种观点宣称，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瑞典等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终结。根据一些和

它大同小异的观点，甚至出现了“西方工人运动重新联合”的迹象。在法国，有些人宣称，如果法国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都尔（法国中西部一城市——译者注）的历史性决裂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在东柏林会议开会期间齐奥塞斯库也用类似的口吻提出了这个问题。

与这些论点相反，对东柏林会议做出任何正确的解释，都必须从1948年以来一直发展着的一种现象出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个现象为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在一系列的矛盾的影响下——这些矛盾又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又是被一个由互相联系着的分隔部分组成的体系联系起来的——这个危机一直在向前发展，时而加快速度，时而放慢步伐、踌躇不前。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可以说是由以下五种危机组成的：

（一）苏联对那些执政共产党控制的危机，首先是对那些领导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因官僚主义而成了畸形——未依靠苏联官僚集团，自己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共产党）的控制的危机。

（二）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苦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控制的危机。这些群众显示出日益高昂的斗志、反资本主义的觉悟，并对官僚集团的操纵明显地表示怀疑；这些群众现在极易受到一支先锋队的虽然是有限的，然而是不断扩大的影响，这支先锋队的影响和作用现在比以往三十年中任何时候都大，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入地在工人阶级之中扎下了根。

（三）东欧和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群众控制的危机，这些群众的政治斗志和积极性正在苏醒。这种危机可以发展到真正的政治革命的边缘（1956年10—11月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